

# 怀念照隅室老人

陈福康

“照隅室”是已故复旦大学老教授郭绍虞先生的书斋。《文心雕龙》在论述各家论文之后曾给出一个总评，谓“各照隅隙，鲜观衢路”。郭先生认为这个评语可以用来对照自己的治学，而且“照隅”二字的读音又和“绍虞”相近，因即以“照隅”名室，可谓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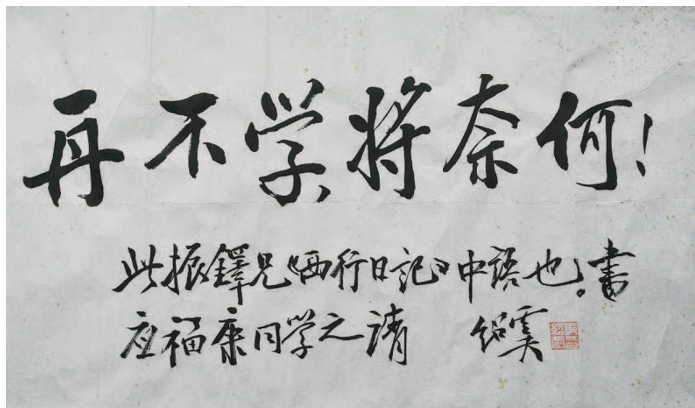
我拜访照隅室认识郭老，屈指算来已在四十多年前了。那时，老人家已经年逾八十了。第一次见他，是复旦顾易生老师带我去的。那天在顾先生家聊天，他忽然对我说：“我带你去看郭绍虞老先生好吗？我也好久没去了。”郭老的大名我已久仰，当然兴奋地跟着顾先生去了。顾先生住在延安西路，郭老家在南京西路，走去不算太远。顾先生那时也就五十出头，他对郭老是非常恭敬的，但相处时却比较随便，有点像我当时对顾先生似的。他问起郭老最近有没有写字，看到桌上有几张字就说：“这就送给我。”我也很想要一张，但郭老小子初次登门何敢张口。顾先生又对郭老提起我的父亲。因为我双亲都是湖州制笔工人，父亲在上海笔墨庄工作，做笔有点名气。我说出父亲名字，老人居然也知道，非常客气地要我回家后再转达他的问候。老人的苏州口音，我听着感到非常亲切，因为我祖母和伯伯都在苏州，伯父还是苏州湖笔厂的负责人。我说起这些，老人对我更亲切了。回家后我告诉父亲，父亲也很高兴。后来父亲叫我给郭老送笔，所以我又去过几次照隅室。

认识郭老后约一年吧，我赶上恢复高考的辅导班，考上了复旦中文系。一次，看到一位祝姓同学得意地在宿舍里高悬着一幅精心装裱的郭老的书法作品，就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请郭老写一幅。但又想到老人年事已高，一直不敢去说。后来，我提前考取了复旦的研究生，开学时中文系安排老教授们与研究生集体见面，朱东润、陈子展、张世禄等老先生都来了，而郭老因年纪更大，住得又远，没请他来。后来我自己去看了郭老。得知我考上研究生，老人非常欣慰，我就乘机请他为我写字。老人问我写什么呢，我不敢请他多写，当时我已开始读郑振铎先生的书了，就请他写郑公《欧行日记》中的六个字“再不学，将奈何”，以此激励自己努力学习。老人高兴地为我写了。

郑公是郭老的挚友。郑公因公牺牲后，郭老写过多篇深情的悼念诗文。早在1919年郭老上五四运动策源地北京求学时，就与在京读书的郑公结交了。郭老当时在北大哲学系旁听并加入“新潮社”，还担任《晨报》副刊特约撰稿人。郑公组织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型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郭老就是发起人之一。1921年郭老结婚时，郑公还做他的伴郎。1922年郭老翻译奥地利剧作家显尼志劳的《阿那托尔》，郑公为之作序，并收入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中。郑公编选文学研究会同人诗集《雪朝》，其中收入了郭老的十六首新诗。1923年郑公发起成立“朴社”，自搞出版事业，郭老也是社员之一。

1931年，郑公领导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会抗争，不愿在不学无术的王云五手下工作，在北平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的郭老便邀请郑公去任教。郑公赴平，开始就住在郭老家里。因此他们曾经是最亲密的同事。当时有个东北学生高兰（原名郭德浩，因崇拜高尔基和罗曼·罗兰而取此名），本来以二晏词为研究方向。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郑公和郭老便指导他改变方向而写《李后主评传》，“意借李煜亡国之痛激励国人奋起抗日”。高兰毕业后参加抗日义勇军，还提倡朗诵运动，他一直记住两位恩师的教导。1933年，郑振铎与鲁迅合编《北平笈谱》，郑公写的序文特请郭老书写并影印，还钤有朱文印章“照隅室”。

抗日战争后期，燕大被日寇封闭，敌伪逼迫郭老去伪北大，郭老拒绝后遂失业。此时在上海沦陷区艰苦斗争的郑公支持郭老的爱国行为，介绍他来上海开明书店工作。从此他俩又同在一地朝



郭绍虞先生赠朱文印章手迹

夕相见，相濡以沫。郑公以“幼秋山馆主人”化名秘密影印《明季史料丛书》，序中说：“亡人国者必亡其史。史亡而后，子孙忘其所自出，昧其已往之光荣，虽世世为奴为婢而不恤。然史果可亡乎？……若夫有史之民族，则终不可亡。盖史不能亡者！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矣！”郑公这篇动人心魄的序，也是请郭老手书印于卷首的。为了迷惑敌伪，书上还有意写了印成于“甲戌”（1934年）——有趣的是，后来的有些版本学家也受了迷惑，很多图书馆都著录为1934年出版。

抗战胜利后，郑公领导成立“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并担任理事，郭老则担任监事。1946年底，郭老与郑公还一起发起组织“中国语文学会”。郑公当时奋力编印多种大型学术图籍，经济上遇到极大困难，1948年1月24日郑公日记中充满感情地写道：“简直是一筹莫展。……绍虞交来‘合资’款八百万，他肯加入，诚为不安！为什么老是穷朋友肯帮忙呢？有此八百，星一的债，可以对付过去了，感甚，几出涕！盖及时之助，较之八千万尤为得力也！”

以上简单回顾了郭老与郑公的兄弟情谊，大多是我后来从各种史料中看来

的。当年我才刚开始研究，知道得还很少，以致竟没想到好好请郭老谈谈这方面的往事。而当我研究渐趋深入而想请教时，老人却不幸逝世了。后来我一想到此，就后悔莫及！例如，郑公当年在燕大愤而辞职的详情，郭老是最清楚的，我却再没机会听他讲述。再如，后来我读到王伯祥日记，得知1956年郭老想离开上海，曾托王先生向郑公提出想到北京工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郑公又是什么态度。总之，我永远失去了极重要的请教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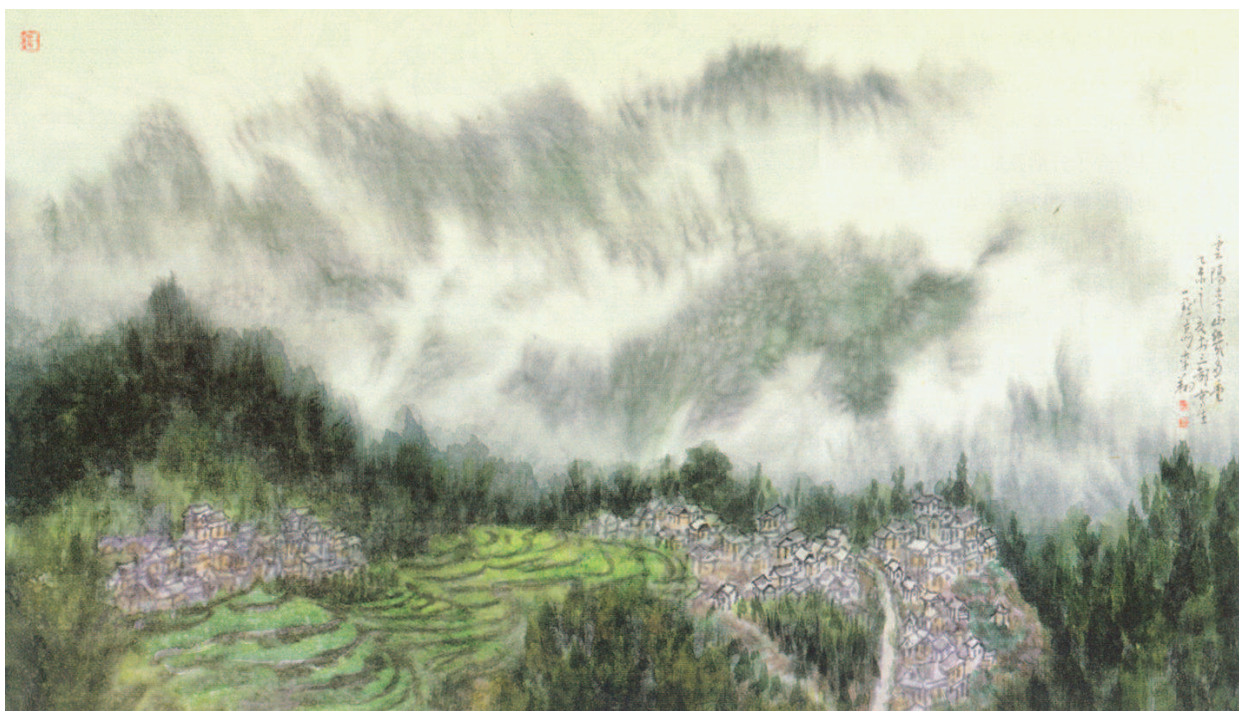
万幸的是，我请郭老题写了《郑振铎年谱》的书名。其实当时我才刚开始写初稿，忽想起应请郭老题签，因老人不仅是书法家，更是当时健在的最老的郑公老友。因此，尽管我知道郭老的时间极其宝贵，正在紧张地整理、修订旧著，但还是冒昧地向他请求。老人二话不说就写了。几个字苍劲有力，是老人晚年上佳书法。我想，这是老人家出于对郑公的深厚感情，也是对我研究郑公的极大的赞许。《郑振铎年谱》是我出的第一部著作，书问世时郭老已谢世四年了。我将永远感激郭老。

回忆郭老时，我不能不同时深深怀念慈祥的郭师母。记得我第一次去郭老家时，师母就亲切地为顾先生和我沏茶

倒水。当时，照隅室墙上挂着一幅国画吸引了我。记得画着四个中年人，好像都穿着中式长袍，文质彬彬，栩栩如生，气度非凡。其中一位是郭老，另外三位我不认识，师母就过来热情地一一介绍，并说他们四人是老的老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另外画的是叶圣陶、顾颉刚、王伯祥三位苏州同乡。画上好像还题有诗。但谁画的，谁题的，诗的内容等等，我现在全忘了。这么多年来，我常会想起这幅画，不知现在何处，应该可算珍贵文物了；我也常想起郭师母指点画幅亲作介绍的情景。

我去郭老家时，郭老一般说话不多，而师母讲得较多。每次师母都热情地要我常去。有一次我去，提到父亲单位上海笔墨庄要恢复“周虎臣”“杨振华”“李鼎和”等著名笔庄的老牌子，父亲想请郭老为“杨振华笔庄”题写店名。那天郭老的女儿正好来看父母，她不认识我，大概认为题写店名是有失身分的，对郭老说：“不要写！”郭师母听见，马上赶过来大声说：“嗨！怎能不写？要写，要写的！”我回家后告诉父亲，父亲说那就不要为难郭老了，他们另请赵朴初先生写。我再去照隅室时，告诉了郭老，郭老连连称赞赵老的字好，而师母却反复向我“致歉”。

郭老逝世时，我去殡仪馆参加了隆重的告别仪式。那天我非常多。我看到瘦弱的师母脸色苍白，神情悲哀，但坚持与赴唁者一一握手。几天后我去看望师母，她反复感谢我，还颤巍巍地要去拿郭老告别仪式上的签到簿给我看一看。我赶紧劝阻了，说我知道那天来了一些什么人，并说簿子上也有我的签名。我请师母节哀保重，师母却要我“仍像自家一样常来”。约半年后，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赴京前也去看过她，她说她在编《照隅室杂著》，出书后要送我。可是后来我回上海时，听说她老人家也驾鹤随郭老而去了……



云隔青山几多重（国画）李翔

## 近读录

# 重识魏格纳

黄昌顺

前些时候在一家图书馆意外看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名典丛书，眼睛一亮，其中有哥白尼著《天体运行论》、伽利略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牛顿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爱因斯坦著《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达尔文著《物种起源》、魏格纳著《海陆的起源》、摩尔根著《基因论》等等。说老实话，对这些大科学家的名著，我一部也没看过。我也明白，照退休后的我现在的年龄，似乎不适合再啃这些科学专著，但这些大科学家的名字给了我挡不住的诱惑，于是我借了本和自己所从事工作比较接近的《海陆的起源》。读科学专著的确没有看休闲书省力，好在我有的是时间，自己多少还有一点基础，于是每天读一点，第二天再重复读，越读越有味道。

魏格纳的名字，在近些年由于进入了科普读物和中小学教科书，已经不算陌生了。都知道他是科学家，还知道他躺在病床上看世界地图时得到了灵感，于是提出了大陆漂移说。仅此而已。我过去虽然了解多一点，但也有限。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陆的起源》，主体部分是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为了方便读者，还编入《海陆的起源》导读和附录等。刚开始阅读，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使我大吃一惊。关于初始研究动机，魏格纳在第一章节写道：“大陆漂移的想法是著者于1910年最初得到的。有一次，我在阅读世界地图时，曾被大西洋两岸的相似性所吸引，但当时我也即随手丢开，并不认为具有什么重大意义。1911年秋，在一个偶然机会里我从一个论文集看到了这样的话：根据古生物的证据，巴西与非洲间曾经有过相连接的现象。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这段文字记载促使我对这个问题在大地测量学与古生物学范围内为着这个目标从事仓促的研究，并得出了

重要的肯定的论证，由此我就深信我的想法是基本正确的。”哦，原来是这样的，魏格纳看地图发现问题并产生想法，是有这回事，但对于启动这项研究并没有起决定作用。这一个关键点我原先从没有听到过。既然魏格纳写得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书籍和文章的作者却视而不见，只是渲染魏格纳看地图时的偶然发现呢？

继续阅读《海陆的起源》一书，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一本书的导读部分写到，魏格纳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大西洋两岸海岸线相似性的人，早在16世纪末，一位荷兰的学者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这比魏格纳的发现早了三百年多！还有，魏格纳也不是第一个认为地球上大陆在水平移动的人，他在书里写道：“我发现有好几个先辈学者的见解是和我一致的。”但是，我们只知道魏格纳，只有魏格纳成为大陆漂移学说的创始人，是公认的20世纪最为著名的科学家之一。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接一个问题地出现，吸引我像侦探小说一样，饶有兴趣地深入读下去。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这部著作共分三篇，第一篇是“大陆漂移学说的基本内容”，第二篇是“证明”，第三篇是“解释和结论”。第二篇“证明”包括“第3章 地球物理学的论证”，“第4章 地质学的论证”，“第5章 古生物学和生物学的论证”，“第6章 古气候学的论证”，“第7章 大地测量学的论证”。第二篇内容最丰富，研究内容包括地球物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生物学、古气候学、大地测量学等多个领域，实证材料涉及的地域包括地球上各个大洲。阅读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我就在想，魏格纳是一名气象学家，要在这么多领域获取证据，论证大陆漂移说，难度何其大也。对这一篇引用的材料所涉及论文和专著，我做了一个粗略统计，发现多达一百多种，魏格纳查阅过而没用上的那些资料和论著肯定还要更多。要知道，那是在上个世纪初，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要获得这么多有用的资料，阅读量多少论文和书刊，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魏格纳并不是简单摘录一些材料和有关研究成果，而是对其逐个进行分析，用这些材料论证大陆漂移说。

比如，《海陆的起源》中引用的论文有些是论述其他假说的，如收缩说、陆桥说等。魏格纳在第五章“古生物学和生物学的论证”中，有这样一段话：“上述许多论据也都被路桥论的信奉者所引用。但是大陆漂移说却从纯生物学的观点提供更为简单的解释。因为大陆漂移论者在解释动植物的分布时，不只证明两岸之间有陆地连接，并且还证明其间有距离上的变化。关于这一点，最

1942年我在大夏大学上学，当时大夏大学的临时校址在南京西路江宁路重华新村弄堂口的那座大楼里，楼下是梅龙镇酒家和成龙照相馆。成龙照相馆楼上有一个房间是京戏票房，那房间平时就是拍照用的大厅，傍晚以后那里很热闹。

有一次我下课经过那票房，看到京戏老师在教戏，有几位公子哥儿在学戏和练胡琴，其中一位练胡琴的看到我进去，十分高兴，叫我来一段。我说我不会唱京戏，他说：没关系，我就教你两句，你唱我拉琴。我对音乐并不陌生，就听他唱，脑子里把他的唱变成简谱，跟着唱了起来。他唱的是小生，是《四郎探母》里的杨宗保。我唱完后，他说唱得好极了。这就大大引起了我对京戏的兴趣，第二天我特地到四马路唱片公司买了一张杨宗保的唱片，在家里练唱。

这也引起了我对京戏的兴趣，我本来是不看京戏的，而且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对京戏有偏见。同学们曾跟我说过：你反对京戏，你京戏看过吗？这一下我就决定去看看京戏，看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它。我认认真真看的第一场京戏是在更新舞台（后改名中国大戏院）看谭富英和梁小鸾演的《打渔杀家》，看到谭富英拿着一把船桨在台上走来走去，梁小鸾做出撒网的动作，就叫人想象出他们在湖上打渔，太有意思了。从此我就爱上了京戏，空下来也会到那个成龙票房去走走。我发现我的嗓子还是唱老生舒服些，不必尖着嗓子唱杨宗保。接下来我大看特看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李少春这些名家的戏，还买唱片学唱。解放后在单位里，我和同好在中午唱京戏，工会还给我们购置了鼓啊什么的，我竟成了个京戏迷。

我真希望更多人爱好京戏，得到很好的乐趣。我如今九十多岁，京戏给了我快乐。不仅是看京戏，还要学唱几句，张口能够哼哼，太好玩了。假使你的嗓子好，大家还要请你表演呢。唱得再好的话，说不定还会下海唱京戏，就像奚啸伯那样！

## 在菲律宾唱京戏

严文井同志曾带领徐光耀、沈虎根和我等几位同志出访菲律宾。有一天我们和菲律宾朋友谈两国文化，谈到了京戏。我们向他们介绍京戏，可以讲的都讲了，可京戏要唱，唱起来是什么味道呢？严文井同志于是指着我：“你不是老哼京戏吗？你就唱两句给他们听听，这样就明白了。”我无二话，唱起了：“头戴紫金盔，齐眉盖顶……”我在单位是天天中午吊嗓子的，又正值壮年，唱得很棒，严文井同志十分满意，菲律宾朋友也高兴极了，大鼓其掌。我就这样在菲律宾唱过京戏。当时我特地选《战太平》这两句唱，因为调门高，听声音就会被震动。

我曾写过菲律宾游记，但此事未写上。

## 说广东戏

我小时候在广州，从不看广东戏。小孩子大概都不爱看广东戏的，因为里面讲的婆婆妈妈故事，小孩子看不懂，也没兴趣。不过乡下来亲戚，住在我家，我作为东道主，只好陪他们去看广东戏。什么《背解红罗》，看过也就忘了。

广东戏和京戏不同，京戏把一些

# 我怎么成京戏迷的（外二篇）

任溶溶

传统戏演来演去，广东戏是天天有新戏。只有一些戏大家喜欢，这才流传下来。

广东戏天天要有新戏，哪来那么多故事呢。他们甚至把好莱坞电影的故事编成广东戏上演。好莱坞老演员范朋克很吃香（梅兰芳访美时就拜访过他），他的电影曾改编成广东戏上演，马师曾就做过这个工作。搬演好莱坞电影，甚至把好莱坞电影的歌曲用广东话歌词来唱。广东戏的唱和京戏不同，自由得多，我小时候也会唱一些，实在是唱好莱坞电影的歌曲。例如《璇宫艳史》的歌改成广东话唱词，就很流行。

我虽不看广东戏，但爱到戏院看剧照，因此很熟悉那些演员。广州广东戏的戏院有乐善、海珠、太平这几家。我都常去看剧照（绝非戏迷），因此上海有亲戚来广州，想看广东戏，我作介绍，如数家珍。他们去看广东戏，也就请我带路了。

每年一到年三十晚，可就热闹了。一些人抬着大牌，敲锣打鼓穿大街小巷，说某某老信（广东戏名角）组成什么班，在什么戏院演出。广州有一条恩宁路，组戏班的地方就在那里。碰到一些乡镇有纪念活动也会到那里请他们组班去演出。我常见组班的店门口坐着人，他们就是等待有组班机会，可以参加的。

上海的广东人也有不少爱看广东戏，前些年有广东戏班来上海演出，我就看过林小群等今天当红的演员，地点在丽都剧场，如今那里已成政协，可见已过去很久了。

们的质疑精神。魏格纳论证大陆漂移说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不断对陆桥说等假说进行质疑的过程。而魏格纳质疑其他假说，不少科学家也对他的大陆漂移说提出质疑。这里举一个例子。《海陆的起源》第三篇第十三章为“大陆漂移的动力”。魏格纳像其他各章一样，引用了当时科学家研究的成果，还列出了计算过程，在此基础上对大陆漂移的动力进行分析。以我有限的学力，我在阅读时觉得魏格纳的论证有根有据，是很有道理的。但与魏格纳同时的一些科学家的思考深入得多，他们指出该项论述存在瑕疵，有的科学家还对有关“驱动力”进行精确的计算，计算结果是该“驱动力”远不能使大陆产生水平运动。正是有了反对者（他们也是真正的科学家）的较真，大陆漂移说只是被作为“假说”。

1912年1月，魏格纳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提出了“大陆漂移”的观点；1915年魏格纳著《海陆的起源》一书问世，此后又经过若干次修订。但过了半个世纪后魏格纳的观点才被科学界接受，我曾经觉得这多少是一个遗憾。是阅读《海陆的起源》一书让我改变了看法。一个新的理论产生，不仅需要支持者，还不能缺少反对意见。反对者给了研究者压力，这种压力又成为研究者研究动力之一，而质疑提出的问题更是将研究推向深入，使理论趋于完善所不可缺少的。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新的科学发现，科学界重新认识魏格纳和他的大陆漂移说，给了魏格纳和大陆漂移说以应有地位。我不禁感叹，这就是科学，这就是科学精神。

读大科学家的科学专著，虽然不那么轻松，但可以获得科学知识，还可以了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过程，感受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成果是怎么得出的，科学家是怎样的人。这种阅读体验是一种特殊的享受。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